

孙犁抗战叙事中的“家”与家国情怀

刘卫东



孙犁先生(1946年摄)和他的抗战题材作品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沦陷,同时,敌后抗日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当时任教于同口小学的24岁的孙犁正在过暑假,不料他等到的不是开学通知而是隆隆的炮声。1938年春,他在家乡安平县参加了抗战工作,告别父母、妻子,一去就是七八年,除了匆匆回家几次,基本是在外地度过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鲁艺从延安到张家口,然后自己徒步回家,见面后一家人抱头大哭——这正是“毁家纾难”的个案写照。有此经历的不只是孙犁一家人,但不是所有离家抗战的人都能如孙犁一样“回家”,他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刻,读孙犁写的冀中那些普通的“家”,重温民族危亡之际他对家国情怀的独特记录,对我们当下的读者来说,是有意有思考的回望之旅。

孙犁在抗战期间一边战斗一边写作,他在1981年的《自序》一文中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孙犁参加的不是战斗部队,从事的是记者、编辑的工作,也因为这个独特的身份,他接触到了战争中根据地的普通民众,并为他们的付出和力量所震撼、感动。很少被研究者提及,但却是孙犁作品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他笔下冀中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家庭大多是“残缺的”,基本没有完整的一家人。作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投宿》,写一个春天的晚上工作队员“我”去熟识的老乡家借宿,房东老人出来招呼“我”,让“我”住到他儿子和儿媳的屋里,并且解释说,儿子当了连长后也让儿媳参加工作了,儿媳今天去开会了,所以房间空着。这件事勾起了“我”的回忆,抗战刚开始这对小夫妇中的丈夫就义无反顾离开了家,现在少妇也扔下“绣花布”出去工作了。同样作于1941年的《女人们》系列短篇小说中的《子弟兵之家》,写小翠的丈夫三太参军上前线了,大年三十也没有回家,村里的孩子们因为她是“子弟兵之家”给她家贴上了“捉汉奸”和“打鬼子”的彩纸,她唱着“孩子长大,要像爹一样,上战场”的歌哄孩子睡觉,觉得“三太那个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

她笑了”。如上所述,与其他抗战作品多是写弥漫着硝烟的残酷战斗不同,孙犁注意到了普通的家庭及其成员参加抗战的情况,尤其注意到家中“父亲”不在而形成的空缺——实际上,他的家庭也是如此。

因此,孙犁的小说中就出现了独特的一类人物形象:战争中家庭里的留守女性。她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村女性,但在抗战中与丈夫一道挺身而出,守护自己的家庭,承担了“家国合一”的重担,自己也因此被“看到”。

孙犁写女性很出色是公认的,他能写出她们的那股自然美好的劲儿,这是孙犁独树一帜之处,正如他所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自序》)孙犁的看法更多来自抗战中的观察,因为相比起来,女性的付出是双倍或更多的。他在《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一文中颇为动情地强调,在抗战中“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亲送走儿子,担负起养家度日和教养孩子的责任”“妇女们表现了并不低于男子的热情和英勇的行动”。由此可见,孙犁是从“家”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贡献的,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地位较低,也不关心小家庭以外的世界,正是抗战让她们走出了家庭,发出了光亮。

其实再考察就可以发现,抗战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孙犁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只不过光芒不如女性而已。小说《荷花淀》和《碑》的主人公就是“老头子”,他们虽然因年龄缘故不能上抗战前线,但也参加了富有个性的敌对斗争。小说《一天》则写的是抗战中逐步成长的孩子們。在孙犁的笔端,出现了同仇敌忾、全民皆兵,一家老小齐上阵的场景。

家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在孙犁作品中成为战斗的堡垒。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1945年,下文简称《荷花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说写了抗战中的水生一家人:父亲、水生夫妇、儿子小华。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一家过着平静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生活。但是侵略者来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美丽富饶的白洋淀,水生参加了抗战并

担任村里的游击组长。因为斗争形势的变化,成立了地区队,水生和伙伴们要离开家。这时,家国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妻子问:“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是农村普通女性很正常的反应——她考虑的是家庭缺少丈夫后该如何运转,既说的是实际困难,又为克服困难做了铺垫。水生回答:“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很明显,冀中地区的军民已经牢牢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参军战士的家庭有人照顾。这篇小说中的父亲是经常被忽略的人物形象,但他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代表了家中的老人——他们无怨无悔支持儿女们的抗战工作。水生走的时候,父亲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父亲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水生走后决心挑起家庭的重担。因为是短篇小说的缘故,小华的形象没有展开,但是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也会参加到抗战中去。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和无数个“残缺”的家庭,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孙犁的《荷花淀》写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白洋淀水乡普通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因此,《荷花淀》在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当其他作品根据真人真事写,试图还原英雄事迹的时候,它写了一个现象,一些普通人。

有多普通呢?作品主人公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水生嫂”和她的伙伴“青年妇女”们。孙犁这么处理他笔下的人物是很恰当的,因为抗战前她们就是一些农村妇女,用《荷花淀》里水生的话说是“落后分子”。但这些女性与以往的时候不一样了,要跟男性比一比,“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而且她们做到了:“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冰上一样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她们的不一样就在于走出了家庭,守在家里的女性摆脱了旧有角色,成长为一群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英雄了。这种变化是孙犁亲身体验到的,印象很深刻,他看到了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从家庭妇女到战士的身份变化,并怀着崇拜、激动的心情为她们写了传记。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代表的是一代女性受侮辱与损害的灵魂的话,孙犁写的“水生嫂”就是抗战期间崛起的新女性的样板,而她未能摆脱丈夫印记的名字,却让人联想到无数的无名英雄——为“水生嫂”取一个确定的姓名反而会损失这层意思了。

孙犁抗战时期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代入感。很多题材作品写抗战英雄在前线浴血奋战,但忽视了他们在家乡的父母和妻儿,而作为“根据地”的“家”,是战士们战斗精神的逻辑起点——只有打败和赶走侵略者,才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孙犁离开家庭走,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多年以后他回顾《荷花淀》的产生时写道:“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下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克制的笔触下,有滔滔不绝的情感在奔涌。远方的魂牵梦绕的家和亲人,永远是文学书写的对象;而孙犁用抗战时期特殊时刻的“家”,书写了一代人刚柔相济、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我早就拥有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6月出版的上下册绿皮封面的《王林选集》,那是我高中时代在地摊所购。书的扉页上有一幅白发老人像,那是王林1984年摄于卢沟桥的照片。我当时年少,不知其何许人也,亦不知其文学成就,只因那书品相好且价格低而购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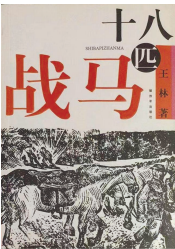
此书收入的短篇小说中,就包括我要说的这篇《十八匹战马》,但是我当时并未读到,也毫不在意。大约在2012年,解放军出版社的友人赠我一套王林新的选集。在长篇小说《腹地》和《抗战日记》之外,另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书名即为《十八匹战马》。我那时虽已仰慕王林之文名,但也只是随手翻翻,依然未之高固。直到我后来真正读起来时才觉震撼,才觉察错过,为之前两次的失之交臂而遗憾不已。

小说讲的是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平原上艰苦环境中人与马的故事。不足一万字的小小说,语言活泼且细腻,讲述如友人间推心置腹,文字隽永而又不事雕琢,显示出作者别样的美学追求。小说以心理活动推进情节进程,看似絮絮而谈,却悬念重重,诗意重重,在悬念与诗意之中又夹杂着诙谐,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娓娓道来,让人忍俊不禁。幽默是有力量的。敌人扫荡的残酷,作家用轻松的笔触写出,以戏谑的口吻说来。这样写正表达了对敌仇的蔑视,同时也描述了冀中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与无畏,这种表达、笔风和大多数抗战小说迥然不同,它尤其注重挖掘战争中的人性,将英雄还原为真实的凡人,绝不是“三突出”和“高大全”,不是单纯的歌颂,小说的震撼力却更强了。

主人公“我”担心在黄家村“坚壁”的骑兵团拥有的十八匹战马被日军发现,决定将它们杀掉,而黄家村村长犹豫不决。“坚壁”在这里是一个专业术语,也并非加固防卫的意思,而是隐藏。那十八匹战马就隐藏在村中的一座破庙里。村民也都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并担心无法向骑兵团的战士交代,战士们白天躲避在庄稼地里,只有夜晚才能回来。这十八匹无法与人类进行语言沟通,又会嘶鸣的战马,“坚壁”它们是一个艰难

马鸣风萧萧

杨仲达



的提心吊胆的过程,且对于军民都是巨大的隐患,倘若被敌发现,不但马将不存,人也将不保。那么既然如此,杀马无疑是正确果断的处理方式,然而善良的军民却为此迟疑,并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虽抱着杀马的决心,却也满腔沸腾着爱马的热血,所以迟迟未能下手。“我”之外的村长、长幼农民、屠户以及三个八路军小战士,都对战马怀有怜悯之心。作者用白描的笔触,记述了敌人扫荡时的乡村真实生活场景,用大量、丰富的细节对话话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全篇没有一个大人物,包括“我”在内都是小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北方的农民,即使是骑兵团的战士,也是农民出身的子弟兵。作者写北方的农民住有传神之笔,他们虽然有牢骚,他们虽然有彷徨,但又乐观、善良,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在战争之中,但又并非全是打仗,他们是生活在战争之中的人。

作者选择了一个相对静态的故事,主要故事情节发生

在村东北角的破庙里,就是商量是否杀马,先杀哪一匹,为什么这一匹不该杀,那匹也不该杀……是农民就爱牲口,是军人就爱战马,所以他们最终的抉择是没有下手,小说原文是这样反复地在说:“我们怎忍的下手杀它们呢?它们是我们战场上的战友,它们跟我们同样处在被敌人扫荡的悲惨境遇里!”“我们其实和战马一样,是一群坚持抗战到底,待命出发的,而又同病相怜的战友。”战马,不是普通的马!

《十八匹战马》是王林以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老百姓舍命保护冀中骑兵团失散战马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而创作的一篇小小说。那时在冀中地区流行着一首抗战歌曲,名叫《我们的铁骑兵》:“快快地跳上战马,挥动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勇敢地冲向前,翻过高山,越过平原,赶上最前线,侦察警戒,步步留心,来到敌后方,打击敌人进攻,保卫边疆,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这支英勇善战的骑兵团,其政治部主任杨经国是王林的同学。王林在这篇小说里通篇虚构,但是杨经国用了真名。“我”于破庙之中,在和赶来八路军战士的谈话中得知,十八匹战马中的那一匹在雪地里站着的小黑马,就是杨经国的马,可他已经战斗中牺牲……

故事的结局是“我”离开之后,当雄鸡报晓之时,那十八匹战马被日军发现并抢走,而舍不得杀马的老百姓虽未直接提及,但被敌人杀害是无疑的。这样的场景,作者并未正面描写,而是给这部作品的结尾以巨大的留白空间。那十八匹战马被日军掠夺的悲壮情境,我每思之都怦心不已,它们都是战士,它们都曾驰骋在冀中平原上,我不由想起杜甫《后出塞五首》中的名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解读山水(十六)

沙湖秋水

李昱坤

从的,大小不等地分散着。芦苇高大挺拔,湖水一望无边,这样的壮丽风光颇似南国水乡。沙湖浩瀚如海,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美丽富饶的宁夏平原上。沙湖水域达万亩、沙丘五千亩、芦苇两千亩、荷花亦千亩,盛产鱼类、鸟类。南面是一片三万亩的沙漠,与那万亩水域相互偎依,颇似佳偶。湖水碧波荡漾,沙海金浪起伏,相映成趣,蔚为大观。

沙湖的秋天异常美丽。游船划开翡翠之波蜿蜒穿行,时有鸟儿从芦苇丛中飞起,翱翔在蓝天上。然而在你昂首而视时,却听得到“哗啦”一声,水面跃起了一条鱼儿。同学介绍,这里栖居了白鹤、黑鹤、天鹅等十余种珍鸟奇禽,百万只鸟儿在这里流连,成为沙湖景色一绝。如果待到日落时分,伴着落日余晖,芦苇摇曳生姿,成群鸟儿从水面掠过,纯然一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实景。

芦苇、游鱼、飞鸟、彩荷、沙漠、远山,就这样构成了沙湖与众不同的景致。秋意渐浓,沙湖风景正好。内心不免思忖,秋日来沙湖,所求无非就是这番韵致。极易使人想到,若沙湖是一幅油画,沙漠、芦苇和湖水,就似经凡·高之手所调出的色彩,缺了哪一色调,都会不如如此美丽的画面。

其实最吸引我的还是天上的那几朵白云,竟能够静止不动。几朵秋云,透着从容与暖意。约一个小时,我望到了水的尽头,水天一色间出现了一条黄丝带。那带子慢慢变宽变大,原来是由一个个沙包串联而成的沙山。与芦苇相比,其色不足,是微黄的。

秋日宜登高,登临意未穷。攀上沙山,举目远眺,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俯瞰沙湖,那芦苇仿佛给沙山镶上了一条翡翠色的花边。沙山上有成排的骆驼,似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塞外江南。偶尔



南国花香(中国画) 陈元龙

一队骆驼经过,驼铃声清脆,悠然回荡,敲人心坎。沙湖自有独特之处,寻常中孕育着美、秀、奇。沙湖之美,在于沙水相融;沙湖之秀,在于水天相映;沙湖之奇,在于苇湖相抱。不由感叹上天造物的奇巧,使之兼具江南之灵秀,塞上之雄浑。

我们于近午时分到达沙湖,快意时光犹犹指间沙。当然等不到日落时分。夕阳微红之时,归返中回望,秋风正打芦苇的梢头掠过。听风时,风起于胸间。芦苇不再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住更远处看,风终于离去,芦苇陡然染上了更加浓重的金黄色,或隐或现。

一场旅行,但求有个美好的记忆。沙湖,是可以让人灵魂歇歇脚的地方。

抗战期间,盘山根据地有大量抗日歌谣在民间流传。这些民谣简洁流畅,刚健质朴,朗朗上口,传递的感情爱憎分明,字里行间洋溢着昂扬的精神风貌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富有很强的感染力量,鼓舞抗日军民团结战斗、夺取胜利。

歌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为根据地军民抗战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歌谣中,有的强烈控诉和鞭挞日伪政权的残暴黑暗统治,如《乌七八糟大杂烩》怒斥道:“富商会,穷警备,杀人放火特务队。活阎王是宪兵队,胡说八道新社会。乌七八糟大杂烩,害得百姓受洋罪。”还有的歌谣揭露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野蛮暴行,表达难以压抑的满腔怒火。在对我根据地和抗日军民“清剿”中,日寇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惨绝人寰的“无人区”,单是在蓟县(今蓟州区)就发生血洗村寨的重大惨案达数十起之多,所到处之处奸淫劫掠,利用枪杀、刀刺、酷刑、火烧、毒气乃至铁犁耢腹等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杀戮村民,遇难同胞中不乏耄耋老人和孩童,日寇罪行可谓丧尽天良,罄竹难书。仅1938年8月25日,日军在州河岸边上仓镇,一次就屠杀我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370人。故而,民谣《州河唱》唱道:“州河水呀流潺潺,流不尽的仇来流不尽的冤。这仇恨把河水快熬尽,这仇恨把铁石要戳穿。”“小日本呀狠凶顽,杀我们同胞占我们家园。全国人民武装团结起来,总有一天打它稀巴烂。”

日寇的野蛮暴行并没有吓倒根据地人民,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巨石上刻下“誓雪国耻”“打倒日本”等标语,表现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积极参军拥军,认定“两个葫芦一根藤,军民本是一家人”(《两个葫芦一根藤》);表示“长城岭上映山红,青年参军最光荣,好钢用在刀刃上,杀敌立功当英雄”(《青年参军最光荣》);“太阳出来红满天,拿起刀枪人抗联”(《拿起刀枪人抗联》)。还有一首深入人心的《抗日歌谣》,表现一位青年农民在入伍之际,不仅自己信心百倍,坚决抗战到底:“大炮连声响,鬼子们不会长,抗日的胜利就

在眼头上”,还请求爹娘、哥嫂、妻子、妹妹支持自己上前线参军杀敌,并嘱咐他们在家搞好生产,拥军支前。根据地的妇女儿童也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组织儿童团》里说:“红缨枪,拿手间,站岗放哨把信传。”《妇女抗日》说:“姐妹们团结起来,抗日工作不落后。千针万线日夜忙,缝鞋袜又送军粮。盘查放哨捉汉奸,掩护伤员不怠慢。支援八路军保家乡,看他鬼子敢逞强!”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抗日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筑成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不断予敌以沉重打击。

这些歌谣中,有不少是对与敌战斗和战斗英雄的颂扬。如《向鬼子进攻》运用快板书的形式,鼓舞战士勇上战场杀敌:“喂,我说,同志们,拿手榴弹,向鬼子碉堡,向鬼子封锁线,投得准来拉得响,把鬼子炸得稀巴烂!”“喂,我说,同志们,刺刀擦亮,向敌人脑袋,向着敌人胸膛,刺得准来刺得狠,把鬼子彻底消灭光!”民谣热情洋溢地歌唱抗日大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八月里,秋风凉,冀东掀起大暴动。农民工人肩并肩,宋(时轮)邓(华)大军逞威风,山摇又地动。李运昌、洪麟阁,打头的还有高司令。二十二县举红旗,抗日烽火耀明。筑起新长城。”(《冀东掀起大暴动》)对于盘山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冀东十三团和团长包森所创立的丰功伟绩,民谣《冀东十三团》以无比自豪与骄傲的口吻赞颂道:“冀东十三团,创建在盘山。团长叫包森,打仗冲在前。生擒日本鬼,消灭狗汉奸。专能打埋伏,炮楼连锅端。敌人吓破胆,威名万古传。”

党的领导是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日军民坚决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坚决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歌谣中说:“共产党好领导,人人都热爱。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朱司令,带领英雄上战场,全是八路军。”(《还乡河小唱》)抗日军民发誓“至死不离共产党”(《至死不离共产党》),认定:“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欺压咱老百姓,还得咱们团结起来赶东洋。”(《八路军好》)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终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此外,还有一类表现青年女子情感生活

战斗的号角 犀利的投枪

——盘山根据地的抗战歌谣

王之望



和时代价值取向的歌谣,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如《高低嫁个八路军》展示那个时代适婚年龄女子掩藏于内心深处的择偶标准,表现了对全民抗战、赶走侵略者这一神圣事业高于一切的执着追求,以及纯洁无瑕的爱情观。《河水常流心常念》里唱道:“红豆粒里藏白心,姑娘大了要嫁人。不图荣华与富贵,高低嫁个八路军”,用常流水巧妙地比喻对参军上前线恋人的坚定支持,语气委婉而言辞果决。“送哥参军到河边,河边人多口难言。指指河水拍拍胸,河水常流心常念。”人多难言的无奈,暗示她平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温顺、不事张扬的姑娘;而指水拍胸的动作,则表现了她的聪慧机敏,更表明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对“参军哥”的真挚爱情永不动摇的决心。

盘山根据地的抗战歌谣是播之于口的信史,是抗日军民在那个特殊岁月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声呐喊和怒吼,值得人们予以珍视和流传下去。

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盘山民兵班合影。本报资料图